



运动员“沽名钓誉”、自我欺骗与体育道德的关系

祝大鹏

摘要:“沽名钓誉”和自我欺骗是阻碍运动员体育道德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以412名(男=220,女=192)运动员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运动员“沽名钓誉”、自我欺骗和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欺骗对“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运动员在自我欺骗和体育道德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运动员表现出了更高的自我欺骗和更低的体育道德水平;(2)自我欺骗对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具有显著中介作用。研究认为,为了促进运动员体育道德发展,应采取措施加强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教育,降低自我欺骗水平。

关键词: 运动员;沽名钓誉;自我欺骗;体育道德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5)05-0088-05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Self-deception and Sportsmanship

ZHU Dapeng

(Wu 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and self-decept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thletes' sportsmanship. Taking 412 athletes (220 male and 192 female) as the subjects and by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self-deception and sportsmanship as well a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elf-deception in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and sportsmanship. The result shows that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exists in athletes' self-deception and sportsmanship. Male athletes usually show higher-level self-deception and lower-level sportsmanship. Self-deception ha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and sportsmanship. The paper holds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thletes' sportsmanship, concret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hance the cognitive education of athletes' sportsmanship and decrease the level of self-deception.

Key Words: athlete;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self-deception; sportsmanship

受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意识始终在各级运动队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强调每一位运动员的重要作用,突出团队力量的重要性。但在运动队取得胜利或失败之后,每名运动员对自己的贡献和责任是如何认识的呢?是否存在夸大自己的贡献或降低自己的责任的现象呢?Banaji等人^[1]将这种合作双方倾向于高估自己对集体成功的贡献,同时贬低他人努力成分的现象称为“沽名钓誉(fishing for compliments)”。如果让一支运动队的每个成员评估各自对团队的贡献时,其百分比之和可能会大于100%。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Caruso等人^[2]认为由于自我注意聚焦和自我记忆提取的便捷性,使个体更容易产生对自身贡献的积极幻觉;而Miller和Ross^[3]则认为“沽名钓誉”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个体的自利性归因偏差。这种归因偏差使得人们难以保持客观的态度来解释事件的成因,造成个体在对成败结果进行归因时,倾向于夸大自己对集体成功的贡献而缩小自己对集体失败所承担的责任。

目前在体育领域内尚未发现针对运动员“沽名钓誉”现象的研究,但与此类似的研究主题,比如“自利归因偏差

(egocentric biases in attributions)”、“自我中心归因(Attribution egocentrism)”和“自我中心偏差(Egocentric biases)”等现象在一些体育、家庭生活的研究领域已经得到证实^[4-6]。王芃等人^[7]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由于沽名钓誉,人们难以客观评估合作者的贡献,这可能影响后续合作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团体凝聚力。

俗话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自己会不会为了欺骗他人而有意识地欺骗自己呢?Gur和Sackeim^[8]提出了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的概念,并通过实验研究(声音识别研究)证实了自我欺骗的存在。Gur和Sackeim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自我欺骗应该符合以下4条标准:(1)个体必须持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2)这两种信念是同时存在的;(3)个体没有意识到其中一种信念;(4)被意识到的信念取决于个体的动机。Tenbrunsel和Messick^[9]认为,个体的道德意识衰退是通过自我欺骗过程得以实现的。国内学者鞠实儿等人^[10]从逻辑学和心理学两个方面解释和检验了自我欺骗存在的合理性。李艺敏^[11]在分析了自我欺骗的研究现状后认为,自我欺骗在个体

收稿日期:2015-03-29

基金项目:2014年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2014B121)

作者简介:祝大鹏,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运动心理学。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武汉430079。

的自我服务偏向、社会称许性、进化等行为中起重要作用。对于自我欺骗的作用,目前的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陆慧菁^[12]研究认为自我欺骗既属于个体的一种心理特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策略。

王芄等人^[7]基于有限道德理论的研究认为,个体的“沽名钓誉”和自我欺骗是个体在道德判断中固有的局限性,表现在人们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观的背离,它导致无意识的道德偏差,使那些平时行为表现良好的人有时也会表现出违反道德的行为。

因此,本文假设运动员的“沽名钓誉”和自我欺骗与其体育道德之间具有显著相关,而自我欺骗对运动员“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的关系具有显著中介作用(如图1所示)。以有限道德理论为依据,选取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为被试,通过调查分析以检验运动员“沽名钓誉”和自我欺骗的现状,以及自我欺骗对运动员“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关系的中介效应,为提高运动员体育道德水平,促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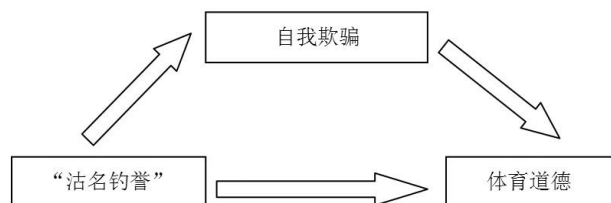


图1 运动员“沽名钓誉”、自我欺骗与体育道德关系模型
Figure 1 Model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Athletes'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Self-deception and Sportsmanship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了取样方便,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研究对象。本文选取450名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12份。其中男性运动员220名,女性运动员192名。被试年龄范围为18~24岁($M=21.45, SD=2.63$),训练年限为2~8年($M=4.28, SD=3.02$)。研究参与者从事运动项目的选取上兼顾集体对抗性项目和个人非对抗性项目,包括篮球、足球、排球、健美操等项目,其运动等级均在二级以上,其中健将级运动员89名,一级运动员138名,二级运动员185名。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研究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Pschy INFO等数据库查阅分析了关于“沽名钓誉”、自我欺骗和体育道德的相关研究文献,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研究主题和方案。

1.2.2 研究工具

1.2.2.1 “沽名钓誉”测量

根据“沽名钓誉”的心理学理论和以往研究模式,首先要求被试评估自己对团队某场比赛获胜所做的贡献水平,

在此基础上评估每个成员平均对团队获胜所做的贡献。该条目表述为“对于你(们)在上一场比赛中获得的胜利,从整个运动集体的角度来看,你认为自己为胜利所做的贡献……”,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远远低于平均水平”(1分)到“远远大于平均水平”(5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沽名钓誉程度越高。

1.2.2.2 期待性回答平衡问卷

该问卷由Paulhus在Sackeim等人^[13]的自欺和他欺问卷的基础上编制而成。该问卷包括“自我欺骗”和“印象管理”两个维度,共40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评定1~7分。该问卷编制的理论基础是,认为具有自欺倾向的个体易于否认心理上有威胁性的想法和感受,总是对自己在众多社会期望行为方面予以夸大,而对非期望行为则加以掩盖。经检验该问卷的总体一致性信度 α 为0.83,自我欺骗维度的一致性信度 α 为0.80,印象管理维度的一致性信度 α 为0.86。国内学者李峰^[14]对该问卷在中国人中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该问卷的 $\chi^2/df=2.0, CFI=0.95, NFI=0.90, PNFI=0.80, PMSEA=0.04$ 。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在中国人群中应用。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在数据分析中只选取了自我欺骗维度。

1.2.2.3 多维体育道德量表

该量表由孙开宏等人^[15]在Vallerand等人编制的“多维体育道德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而成的。修订后的量表包括5个维度共25个条目,分别是“完全承诺”、“社会规范”、“规则裁判”、“尊敬对手”和“工具性攻击”,每个维度各5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1~5分。经检验该量表Cronbach α 为0.861,“完全承诺”、“社会规范”、“规则裁判”、“尊敬对手”和“工具性攻击”维度Cronbach α 分别为0.704、0.713、0.742、0.695和0.733,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1.2.3 数据处理

研究对收集到的数据使用SPSS20.0在计算机上进行处理。由于抽样采用方便抽样形式,因此在数据处理上以非参数检验为主,主要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2 研究结果

2.1 运动员“沽名钓誉”、自我欺骗和体育道德的性别差异

为了检验运动员在自我欺骗和体育道德上的性别差异,研究对收集到的“沽名钓誉”、自我欺骗和体育道德测试数据进行了独立样本Mann-Whitney检验。结果显示(表1),运动员在自我欺骗、体育道德的除完全承诺维度之外的各维度与总分之间均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p<0.01$),男运动员在“自我欺骗”和“工具性攻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运动员,而在“尊敬规则和裁判”、“尊敬社会规范”、“尊敬和关心对手”以及体育道德总分上均显著低于女运动员。另一方面,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在“沽名钓誉”上未表现出显著性别差异($p>0.05$)。



表 1 运动员沽名钓誉、自我欺骗和体育道德的性别差异非参数检验

Table I Non-parametric Test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Athletes'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Self-deception and Sportsmanship

	沽名钓誉	自我欺骗	完全承诺	尊敬规则和裁判	尊敬社会规范	尊敬关心对手	工具性攻击	体育道德总分
男 (M±SD)	3.240±0.741	12.951±2.92	20.756±2.89	17.671±3.30	14.744±2.64	14.743±2.64	14.951±2.92	88.18±10.46
女 (M±SD)	3.250±.660	10.521±3.14	20.688±2.83	20.804±2.56	19.116±2.80	18.115±2.80	10.521±3.14	94.036±8.49
Mann-Whitney U	5642.000	4891.500	5634.500	4658.500	4835.000	3916.000	4001.000	4928.000
z	-0.040	-1.981*	-0.052	-2.205*	-2.012*	-3.854**	-3.653**	-2.160*
sig. (双侧)	0.968	0.043	0.959	0.027	0.010	0.000	0.000	0.015

注: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2.2 运动员的“沽名钓誉”与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

为检验运动员“沽名钓誉”与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对“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进行了相关分析。由于“沽名钓誉”是分类变量,因此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Spearman 等级相关检验。结果显示(表 2),运动员的“沽名钓誉”与“尊敬规则和裁判”、“尊敬社会规范”以及“体育道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低相关, p<0.05),与体育道德的其他维度之间未表现出显著性相关(p>0.05)。

表 2 运动员“沽名钓誉”与体育道德之间的相关检验

Table II Test f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thletes'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and Sportsmanship

	完全承诺	尊敬规则和裁判	尊敬社会规范	尊敬和关心对手	工具性攻击	体育道德总分
沽名钓誉 r	-0.088	-0.124*	-0.397*	-0.109	0.085	-0.411**
沽名钓誉 p	0.195	0.035	0.026	0.107	0.211	0.008

注: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2.3 运动员自我欺骗与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

为检验运动员自我欺骗与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Wilcoxon 相关检验。结果显示(表 3),运动员的自我欺骗与体育道德的“完全承诺”、“尊敬规则和裁判”、“尊敬社会规范”和体育道德总分之间均表现出了显著负相关(低相关, p<0.01),与工具性攻击维度之间表现出显著性正相关(低相关, p<0.01),而与尊敬关心对手维度之间未表现出显著性相关(p>0.05)。

表 3 运动员自我欺骗与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检验

Table III Test 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Athletes' Self-deception and Sportsmanship

	完全承诺	尊敬规则和裁判	尊敬社会规范	尊敬和关心对手	工具性攻击	体育道德总分
自我欺骗 r	-0.183**	-0.298**	-0.257**	-0.037**	0.268	-0.145**
自我欺骗 p	0.007	0.000	0.000	0.586	0.000	0.032

注: ** 表示 p<0.01

2.4 运动员的“沽名钓誉”与自我欺骗之间的关系

为检验运动员“沽名钓誉”与自我欺骗之间的关系,对“沽名钓誉”和自我欺骗进行了相关分析。由于“沽名钓誉”是分类变量,因此,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的是 Spearman 等级相关检验。结果显示,运动员的“沽名钓誉”与自我欺骗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低相关, r=0.199, p<0.01=0.003)。

2.5 运动员自我欺骗对“沽名钓誉”与体育道德关系的中介效应

经相关检验可以得知,自我欺骗与“沽名钓誉”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两者与体育道德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运动员“沽名钓誉”与体育道德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因此,自我欺骗对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之间关系可能存在中介效应。

为了进一步检验确认自我欺骗的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6],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检验。首先检验“沽名钓誉”对体育道德的预测作用。“沽名钓誉”作为自变量,体育道德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 4,图 2),“沽名钓誉”对体育道德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β=-0.42, p<0.01);其次,以“沽名钓誉”作为自变量,自我欺骗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沽名钓誉”对自我欺骗的回归系数也达到了显著水平(β=0.44, p<0.01);最后,以“沽名钓誉”和自我欺骗分别为自变量,体育道德为因变量时,两个变量均表现出了对体育道德的显著回归效应(β=-0.31, p<0.05; β =-0.39, p<0.05)。由于各变量间的回归系数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自我欺骗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量为 0.15(0.44*0.31)。

表 4 自我欺骗中介效应检验的层级回归检验

Table IV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est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Self-deception

	自变量	因变量	F	B	SE	β	t	ΔR ²
第一步	沽名钓誉	体育道德	66.52	-0.63	0.41	-0.42	3.99	0.59
第二步	沽名钓誉	自我欺骗	89.81	0.44	1.53	0.44	4.62	0.60
第三步	沽名钓誉	体育道德	64.22	-0.34	0.76	-0.31	2.09	0.55
	自我欺骗	体育道德	43.16	-0.37	0.06	0.39	-2.01	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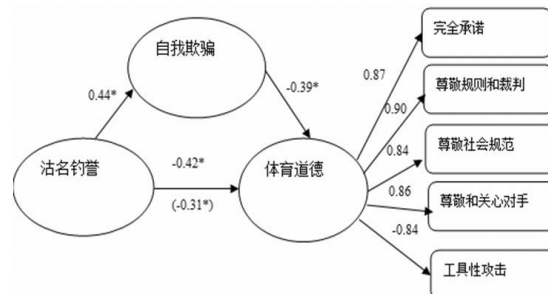


图 2 自我欺骗的中介效应检验 (* 表示 p<0.05)

Figure 2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Self-deception (* means p<0.05)



3 分析与讨论

3.1 运动员体育道德的性别特征

本研究表明,女运动员的体育道德水平显著高于男运动员,与男运动员相比,女运动员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良好体育道德和更低水平的不良体育道德。孙开宏等人^[15]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对于这一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目前较多的解释是从不同性别的社会文化角色定位角度进行分析。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文化更强调男性的权力、能力和价值、财富等因素,而对女性则更加突出服从、顺应等因素。在体育比赛中,相对于女性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男性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则更可能被社会文化所容忍。因此,有学者^[17]认为不同性别的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参照系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Gilligan^[18]研究认为,男性和女性在道德发展的速度和规律上也存在差异,男性更关注“公正”的道德价值,而女性更多关注的是“关怀”的道德价值,这种差异体现在个体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上。因此,女性运动员在体育道德水平上比男性运动员更高。另外,在自我欺骗上,男运动员也表现出了显著高于女运动员的自我欺骗水平。

3.2 自我欺骗的中介效应

研究表明运动员的“沽名钓誉”表现对其体育道德具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随着运动员“沽名钓誉”程度的增加(即越夸大自己对胜利的贡献),其体育道德水平则出现下降的趋势(更可能出现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有研究认为^[2],高“沽名钓誉”者更倾向于自我注意聚焦,过多地关注自身的贡献而忽视了他人的贡献;另一方面,“沽名钓誉”的个体存在自利性归因偏差,对于成功则倾向于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贡献,而对于集体的失败,则倾向于认为自己承担更小的责任^[3]。因此,为了突出自己对集体的贡献,运动员在比赛中会更多地表现出不良体育道德行为以达到获胜的结果。

对于这一结果的另一种解释是自我服务偏向的作用。Blackwood 等人^[19]研究认为,自我服务偏向作用使个体把自己与满意的事件和结果联系起来,而远离不满意的事件和结果,从而通过表现出一种积极动机的作用。因此,运动员在比赛中为了获得满意的结果,会使用包括违反体育道德行为在内的不良行为来达到目的。但目前这一解释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

研究表明,运动员的自我欺骗对“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的关系具有显著中介效应,高自我欺骗者比低自我欺骗者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体育道德。李艺敏^[11]在总结了前人此类研究后指出,社会赞许性是导致高自我欺骗者表现出良好体育道德的主要原因。另外,也有研究指出,自我欺骗有助于个体压抑负面情绪^[20]和抑制反社会思维和行为^[21],并且可以提高个体的自信和自我良好感觉^[22,23]。有研究发现,自我欺骗可以提高个体的控制感,从而使个体保持较高的道德判断标准,促进利他行为的出现^[24]。因此,具有“沽名钓誉”特质的运动员为了夸大自己在集体胜利中的贡献,缩小自己在集体失败中的责任,会在多数情境中表

现出更高的体育道德,以减轻由于自己将来在重要比赛的关键时刻违反体育道德行为而带来的消极心理体验。

而进化理论认为自我欺骗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策略,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欺骗其他个体。由于直接的欺骗容易被他人识破,所以运动员会采用欺骗自己之后“诚实地”向他人传递错误信息而不被觉察。比如在一场重要的篮球比赛的最后时刻,落后一方(落后 1 分)的某个持球队员由于害怕失误造成球队失败被队友指责而不敢投最后一个球,把球传给队友,结果队友投篮命中绝杀对手。这时该队员就会向队友和教练表示是自己的无私传球队友才有机会完成绝杀,从而显示自己才是球队获胜的最大功臣。因此这种高体育道德水平并不是运动员的内在道德观的真实体现,而是为了获得社会和他人的认可,突出自己对集体的贡献而表现出来的行为。这种虚假的体育道德会阻碍运动员对自身问题的客观认识,对于运动员的体育道德素质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意义。有研究表明,高自我欺骗者具有较低的焦虑敏感性水平,在解决问题时更多的采用否认的策略,较少采用任务取向的问题解决方式^[25]。Hirschfeld 等人^[26]研究发现自我欺骗会减少个体的努力程度而不利于其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

自我欺骗虽然从短期效应来看对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表现具有积极意义,但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健康发展来看,自我欺骗表现出的负面作用需要引起重视。因此,虽然本文结果表明自我欺骗对运动员的“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具有显著中介效应,但在运动训练和竞赛实践中,教练员和体育管理人员仍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认知水平,树立良好体育道德榜样,培养运动员良好体育道德行为。

4 小结

本文对运动员“沽名钓誉”、自我欺骗与体育道德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检验了自我欺骗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男运动员在自我欺骗和工具性攻击水平上显著高于女运动员,而在体育道德上显著低于女运动员。在“沽名钓誉”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别差异。其次,研究结果发现运动员“沽名钓誉”特质与体育道德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低相关)。此外,研究还发现自我欺骗对运动员“沽名钓誉”和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中介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参与者的选取采用整群方便抽样而不是随机抽样,可能存在抽样偏差造成研究结果的虚假效应;另一方面,本文借鉴了心理学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只通过一个条目测量评估运动员的“沽名钓誉”程度,其测量的有效性需要今后的研究进一步检验。因此,本研究对运动员“沽名钓誉”、自我欺骗与体育道德的关系仅进行初步检验,今后的研究需要扩大研究参与者的多样性、研制科学的运动员“沽名钓誉”测量工具,以及采用新的研究范式对这一主题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Banaji M. R., Bazerman M. H., Chugh, D.. How(un) ethical



- are you[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3,81(12):56-64,125.
- [2] Caruso E. M., Epley N., Bazerman M. H..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undoing egocentric responsibility assessments in groups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6,91(5): 857-871.
- [3] Miller D. T., Ross M.. Self-serving biases in the attribution of causality: Fact or fiction[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5,82(2): 213-225.
- [4] Brawley L. R..Unintentional egocentric biases in attributions[J].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1984,6:264-278.
- [5] Forsyth D. R., Schlenker B. R.. Attribution egocentrism following performance of a competitive task[J].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77,102(2):215-222.
- [6] Ross M., Sicoly F.. Egocentric biases in availability and attribu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9,37(3),322-336.
- [7] 王芃,王忠军,李松镡.好人也会做坏事: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8):1502-1511.
- [8] Gur R. C., Sackeim H. A.. Self-deception: A concept in search of a phenomen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9,37:147-169.
- [9] Tenbrunsel A. E., Messick D. M.. Ethical fading: The role of self-deception in unethical behavior[J].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4,17(2):223-236.
- [10] 鞠实儿,赵艺,傅小兰.自我欺骗的认知机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3(5):19-26.
- [11] 李艺敏.自我欺骗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2007,30(6): 1445-1448.
- [12] 陆慧蓉.自我欺骗:通过欺骗自己更好地欺骗他人[J].心理学报,2012,44(9):1265-1278.
- [13] Paulhus D.. Paulhus Deception Scales (PDS): The Balanced Inventory of Desirable Responding-7: User's manual. North Tonawanda, NY: Multi-Health Systems.1998.
- [14] Feng li, Yongjuan li. The balanced inventory of desirable responding(BIDR): a factor analysis[J].Psychological reports,2008,103: 727-731.
- [15] 孙开宏.青少年运动员体育道德的预测与干预[D].华东师范大学, 2011.
- [16]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 [17] Allison M.T.. Sportsmanship: Variations based on sex and degree of competitive experience [M].Fort Worth, TX: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82:153-165.
- [18] Gilligan C..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9] Blackwood N.J., Bental R.P., Simmons A.. Self-responsibility and the self-serving bias: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causal attributions[J].Neuro Image,2003,20(2): 1076-1085.
- [20] Robinson M. D., Ryff C. D..The role of self-deception in perception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ppiness[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9,25:596-608.
- [21] Otter Z., Egan V.. The evolutionary role of self-deceptive enhancement as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antisocial cognition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7,43:2258 - 2269.
- [22] Linton D. K., Wiener N. I.. Personality and potential conceptions: Mating success in a modern Western male sample[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31:675-688.
- [23] Wrangham R.. Is military incompetence adaptive[J].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1999,20:3-17.
- [24] Lu H. J., Chang 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lf-deception and moral self-concept as functions of self-consciousnes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1,51:845-849.
- [25] Werhun C. D., Hons B. A., Cox B. J.. Levels of anxiety sensitivity in relation to repressive and self-deceptive coping styles[J].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1999,13:601-609.
- [26] Hirschfeld R. R., Thomas C. H., McNatt D. B.. Implications of self-deception for self-reported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al dispositions and actual learning performance: A higher order structural model[J].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2008,68:154-173.

(责任编辑:杨圣韬)